

## 寻迹羊城

## 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见证两千年城建史文化脉络

□ 张强禄

2023年4月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东省广州市松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非正式会晤时指出，了解今天的中国，要从了解中国的历史开始。同样，了解今天的广州，也要从了解广州的历史开始。现代意义上的广州考古，历七十余年发展，经几代人接续努力，已基本把距今五六千年前到明清时期的广大广州区域及云山珠水间的广州城发展脉络勾勒而出。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从史前到近代，从城市到乡村，广州地区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广州考古人在配合城市建设进行的考古工作中始终把对考古遗产的保护、研究和阐释放在首位，并逐渐摸索出适用于本地区的文物保护模式，传承岭南文明，赓续广州城脉。

2024年12月27日，“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最新考古发现成果在工地现场向公众发布。遗址正处于如今极度繁华的北京路商圈，亦是以前的广州古城腹地、广州城建之始所在地。该遗址不仅让我们清晰得见古城两千多年的城建史，更充分反映出广州作为不多见的古今重叠型中心城市之丰厚历史底蕴。

读懂广州，离不开考古学。



2024年12月，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发掘区全景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A6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地处2014年5月公布的“广州古城至珠江两岸”地下文物埋藏区核心区域，位于以北京路“千年古道”为中心的广州古城传统中轴线上。其东北隔中山四路、中山五路即为西汉南越国及五代南汉国的宫署和御苑遗址，其北捷登都会商厦位置曾发掘有宋至明清的六脉渠遗址，西南不远处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汉御花园“药洲”遗址，其东隔小马站巷的大马站片区曾发现有南越国水井、南汉国宫苑遗址等，而南边沿着大马站巷、小马站巷、流水井巷一路到西湖路都是成片分布的明清书院群，再往南则有光明广场和大佛寺大雄宝殿下面原址保护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和南汉国大型建筑砖铺地面。而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2024年度的发掘更是揭露了不晚于西汉的大型建筑柱坑遗迹，明确东汉始筑、不断修补沿用至晚唐的西界城墙，与南汉“仙湖”及宋代“西湖”有关的石砌堤岸，五代南汉至两宋时期的大型建筑垫土、磉墩、路面，以及明清流水井古道和与书院建筑群相关的基址。的确，我们可以从“小马站-流水井”这一处古城遗址出发，看尽广州2200多年的城建史。

小马站-流水井遗址东北发掘区东汉土筑城墙墙体之下叠压的西汉时期大型柱坑，目前年代还不确定是否能到南越国时期，但对应其东侧大马站商业中心的南越国水井和南边光明广场的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位置，可以推定这些柱坑当与西汉广州城核心区的官署建筑群相关。东汉土筑城墙之上，则分别有从东晋、南朝到唐代不同阶段的包砖城墙，由此明确这里至少从东汉开始直至晚唐都是广州古城的西界，没有变动过。砌筑讲究且多次扩筑加建的东晋-南朝的包砖城墙、马面等，正是



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发掘区已清理城墙区全景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 从一处遗址，看广州两千年城建史

“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岭南地区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写照。而大唐盛世，海贸繁盛，万国来朝，广州城西界也未变动，只是在西城外蕃坊林立，胡汉杂处，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光孝寺、六榕寺、怀圣寺等更是宗教文化多元包容的见证。根据小马站-流水井遗址东端揭露出的遗迹和出土文物，再结合大马站商业中心、广百新翼、大佛寺大雄宝殿以及解放路安置房项目等工地的考古发现，不难看出唐代广州城政治文化中心与商业宗教中心的分布内外有别，这既与文献史料中不见唐代广州城有大规模改扩建的记载相吻合，也和唐代城市住宅区（坊）与交易区（市）严格分开的城市管理制度相一致。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割据岭南的地方政权，前后经历55年，算是五代十国中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史载刘岩称帝，改广州为兴王府，大兴土木，凿平番山、禺山，扩建广州城。南汉宫署区就在今广州市中山四路-中山五路一带，文献记载有乾和殿、玉堂珠殿、昭阳殿、文德殿、万政殿等多座宫殿。宫城南面是皇城，是中央官署集中的地方。皇城以南至珠江两岸称新南城，是商业区。北京路“千年古道”揭露出的南汉时期铺砖路面距地表以下约2.3米，是兴王府南北向中央大街，北面正对宫城正南门，南面通向皇城正南门——鱼藻门。兴王府西南面开凿有“仙湖”，为皇家苑囿，今“药洲”遗址当属其一部分。小马站-流水井遗址东汉至唐代的城墙以西发现有南汉至北宋时期砌筑考究的堤岸遗迹，且原来地势基本一直向西南倾斜，靠近教育路的探方发掘至现地表下约9米方见原生土，这一带北至中山五路、西至起义路、南至惠福西路，可能都属于南汉“仙湖”、宋代“西湖”的区域。“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20世纪90年代先后配合公园前地铁站、吉祥大厦（现名捷登都会）的建设在中山五路及其以北揭露出宋至明清时期的六脉渠中的“左一脉”渠遗址，按其南北走向在小马站-流水井遗址发掘区西部当有宋至明清六脉渠穿过，但本次考古发掘并未发现有关六脉渠的渠壁遗迹。不知是位置偏移、改造，或者六脉渠到此是利用了原西湖的水域作为城市水域穿城而过，连通珠江。北宋是继五代南汉之后广州城大规模扩建的时期，原兴王府都城为子城，向东西两侧扩展，形成东城、子城、西城三城并列的格局，南宋时又增建南城（“雁翅城”）。西城界到今人民路，西城依旧是蕃汉杂居、百货汇聚为主的商业区。从2014年开始，配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改扩建工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发掘出宋代广州西北城墙、护城河以及护城河外紧邻东风西路的大量生活建筑类遗存，显示两宋时期这里可能存在集镇或草市类的场所，这也是五代南汉以后城市规模扩大、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繁盛的写照。

这些考古发现无不揭示出自唐宋变局，南宋时又增建南城（“雁翅城”）。西城界到今人民路，西城依旧是蕃汉杂居、百货汇聚为主的商业区。从2014年开始，配合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改扩建工程，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发掘出宋代广州西北城墙、护城河以及护城河外紧邻东风西路的大量生活建筑类遗存，显示两宋时期这里可能存在集镇或草市类的场所，这也是五代南汉以后城市规模扩大、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繁盛的写照。结合小马站-流水井遗址隔教育路对面的市政建设项目的考古发现，除了可能存在的六脉渠之外，明清时期围绕着大小马站这一片区应该密集分布的都是祠堂、书院、民居、商铺等民用建筑。所以在唐宋遗迹之上发现大量的墙基、柱础、地面、水井以及与现在的流水井路连为一线的明清流水井古道，为即将开展的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提供了历史更为久远、内涵更为丰富的考古实证资料，也充分反映了广州作为不多见的古今重叠型中心城市丰富的历史底蕴。著名考古学家徐莘芳先生曾说过：“在古今城市重叠的现代城市中，一般地说都保留着古代城市的遗痕。所谓‘遗痕’，是指古代城市的城墙、河湖、街道和大型建筑所遗留的痕迹，它反映着城市本身的历史变化。”新时代以来广州很多城市考古发现所揭露出的这些“遗痕”，用从上到下、从晚到早的层累的倒叙方式讲述着广州2200多年的城建史。

## 树立“大考古”思路，让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

考古遗迹和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必须保护好、利用好。

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8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郭京宁院长介绍，近年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配合中轴线申遗，先后完成了正阳桥遗址、永定门内中轴历史道路遗存、天桥遗址等考古发掘与保护工作，真实再现了中轴线南段的真实面貌，再证了中轴线南段的真实性、延续性和完整性。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地处广州传统中轴线核心区域，发掘重心就是配合越秀区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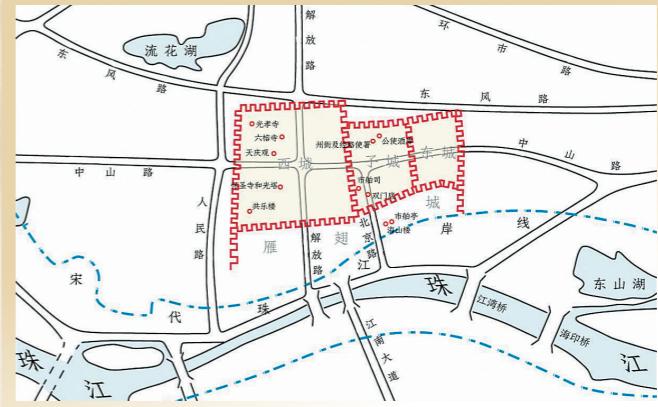
（北地块）展开的。整个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涉及范围15400平方米，随着后续工作的有序推进，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二、三期的发掘与保护工作也会按程序继续进行。如何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延续城市文脉，使历史和当代相得益彰，用“绣花”的功夫和智慧，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这不光是城市规划和建设者的职责，更是我们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对于广州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要树立“大考古”的思路，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加快考古资料整理，深化考古成果和历史文化遗产研究阐释。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讲好广州故事、湾区故事、岭南故事。尤其大小马站书院群紧邻西湖路“百年花市”，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行花街”是历年广州春节的重头戏。2024年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5年1月29日，第一个“非遗”春节如约而至，处处洋溢着喜庆与祥和。怎样在保护第一、加强管理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价值、有效利用，把考古遗产、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以及非遗民俗、北京路商圈等有机结合，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将是未来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发掘、保护、展示与活化利用面临的大课题，也是践行落实国家文物局部署的“提升考古遗址保护利用水平，促进考古成果转化和多渠道传播普及，系统揭示中华文明的面貌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的2025年重点工作。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赓续城脉，读懂广州。（作者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

## 从子城到三城：广州城墙的千年稳定格局与宋代扩展

□ 李灶新



▲ 宋代，广州修城砖。2024年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出土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卷

子城而废久不修，恐缓急无以御盗。于是，太常少卿魏瓘实知广州，遂城之，环五里”。魏瓘修城可谓及时，因子城竣工后不久，便迎来侬智高进攻。他听说广州没有城墙，且生活富庶、商户云集——“可以鼓行剽掠，遂自邕州浮江而下，数日抵广州”，“城外蕃汉数万家悉为贼席卷而去”。动乱虽最终平息，子城未被攻破，但广州城西“百年生聚，异域珍玩，扫地无遗矣”。这一事件促使朝廷下定决心，修筑东城与西城。

晋、南朝时期，广州一直是州（梁、陈、陈朝为都督府）、南海郡的治所。隋时广州为总管府、南海郡都。唐时广州为都督府（总管府）和岭南东道及岭南节度使府的治地。从晋至唐，广州城的规模不大，也未进行过大的扩展。到唐末天祐三年（906年），清海军节度使刘䶮以南城尚险，凿平禺山以益之”，把广州城向南扩展，号新南城。后刘氏称帝，广州作为南汉都城兴王府的所在地。

至宋代，广州城进入历史上最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广州城的范围空前扩大，在唐代子城的基础上重修子城（中城），然后又在子城之东修建东城，在子城之西修筑西城，谓之宋代广州三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以旧城低隘，上请乃连三城为一”，并把广州城进一步向外扩展，从此，宋代广州三城旧址湮没。

如今，广州老城区中心已是高楼林立，关于宋代广州城的具体地理位置和城市布局等已难逐一考证。过去，研究广州历史地理的徐俊鸣、曾昭璇等专家学者曾根据文献史料，就宋代广州城的方位、范围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配合广州城市建设中，不断有关于宋代广州三城遗迹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2024年12月27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位于越秀区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的“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公布最新考古发掘成果。此次发掘面积共2400平方米，现存堆积从汉代一直持续至晚民国时期。在发掘区域东部揭露出东汉晚期、东晋、南朝及唐代广州城西城墙的一段及其附属设施。结合历史文献和东汉墙体下更早时期的柱洞、灰坑等遗迹，东汉城墙应是广州刺史步骘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在南越国时期建筑基础上重建番禺城时修筑的。据此，我们可基本确定，从汉至唐，广州城的西城墙其重要一段，位置均在于此。

广州，我国第一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超过两千年建城史，其城市形态演变特别是城墙的变化发展，一直是城市考古研究的重点。自南越国至明清时期，考古发现逐渐勾勒出广州古城的衍生轮廓，而城市中心始终位于今天的北京路一带，这一现象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极为罕见。值得重点关注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自汉代以来格局基本无改的“广州城”，何以在宋代开始大规模扩建东城和西城？此变局与历史人物侬智高密切相关。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僚族（今广西靖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因受交趾国欺压，多次请求归附宋朝得不到接纳而举兵反宋，在攻占邕州后，沿江西一路东下，直逼广州城下，虽未攻陷，却使城西繁华番坊商业区遭受重创。由于广州是宋朝最早设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城市，也是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朝廷与民间均意识到筑城护商之重要性，为保境安民，广州城开启了大规模扩建之路。

欲深入了解广州城墙变迁，从相关历史人物入手，是一种关键而生动的视角。

圆

任器，或主持修建了最初的番禺城，又称“任嚣城”。广州建城史，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214年，秦定岭南，南海郡尉任嚣主持修建城垣，此乃广州建城之肇始。公元前207年，秦亡。公元前203年，赵佗拥旄岭南，建南越国。目前未发现确切的秦番禺城墙，但在广州市中心的南越国宫署遗址最底层却发现有秦代的水井和用木石构筑的护岸，以及云纹瓦当建筑构件等，可以得知南越国都城是在秦代番禺城的基础上建成的。南越国番禺城的南城墙或仅见于西湖路光明广场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的一部分。北城墙则应在今天越华路南侧，因2006年在此发现了南越国宫城的北城墙。

步骘，或是较早可知的建城之人。建安十五年，东吴孙权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当他来南海郡，站在赵佗王宫旧址之上远望，观番禺形势“负山带海，博敞渺目，高则桑土，下则沃衍”，不由感叹“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于是请准于孙权，把交州治所从广信（今广东封开）迁到番禺。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州番禺，筑立城郭”。

唐朝时“州城三重”盛境，则由鉴真和尚目睹。《唐大和上东征传》有曰：“端州太守迎引送至广州，卢都督率诸道俗出迎城外……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紫绯满城，邑居逼侧。”鉴真和尚应是从如今天字码头登岸，往北穿过三道城门而得见“三重”城景，即由南往北依次为罗城（又称外郭城）、子城及位于子城靠北处的牙城。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元和十四年（819年）条曾解释：“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卫节度使居宅，谓之牙城。”

唐至五代，番坊盛炽，海丝复兴。而在朝代更迭与风云变幻中，广州城墙始终未大规模重修。直至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官方才终于“松口”，批准广州修筑一座子城，以护卫府衙和官署附属建筑。“知广州任中师请修广州子城，仍请置巡海军两指挥，从之。景祐间，中师尝知广州，以州独有

西城的东界，就在今天的旧仓巷西侧。2002年，在大塘街东侧的鸿晖大厦建设工地考古发掘出一段宋至南北向的河堤遗址。2006年在中山四路和旧仓巷交汇处西侧的广州城投集团附属建筑工地又考古发现了一段南北走向的汉代至宋代重叠的城墙基址。结合文献资料记载以及现有地形地貌综合考察，今旧仓巷、大塘街西侧一带就是宋代广州子城东城城址所在，其东侧则是子城东门外的清水濠的所在位置。

1996年在越华路银山大厦和1998年在银山大厦西侧发现的宋代东西向城墙基址，为确定宋代子城的北界提供一个准确的地理论据。这两次发现的宋代城墙均位于唐代广州城东城之东，横跨宋代清水濠之上而建，可知这两段城墙应是宋代广州东城的北城墙。据文献资料记载，宋代广州东城与子城是连为一体的，子城和东城的北城墙是连成一直线的，其北界亦即东城的北界，其位置在今越华路南侧。子城的南界，由于到目前为止没有经考古发掘的城墙遗址发现，只能根据文献记载作推测。2002年在北京路广州百货大厦东门前发现宋、明、清的古门楼建筑基址，发掘者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考诸文献认为其为唐宋以来广州城内著名的双门古楼遗迹。双门古楼源于唐末刘隐凿平番、禺二山，叠石而建的双阙，上为谯楼。随着宋代广州子城的南扩，改南汉双阙为双门，双门古楼成了子城内大都督府前的标志性建筑，由双门再往南才是子城的正南门——镇安门（后改为南门）。2000年在西湖路光明广场发现的唐代南北走向的城墙基址，向南至惠福东路尚未尽，证明宋代广州子城的南界应逾过今惠福东路，但向南不会逾过明代广州城南护城河——玉带濠。结合此前在文德北路富春东方广场工地考古发现东西走向的唐、五代城墙基址可推测，宋代子城的南界也就在此明文路、大南路一线的位置。

在此再略述此前对东城及西城四至的初步认识。东城的西界，根据郭璞《广东通志》记载：“（东城）西与子城门相接，是为东城子城为一。”可知东城的西城墙即子城的东城墙。东城的北界如上述，亦即子城北界。东界或可推至今越秀北路一带，南界当在今天的文明路北侧一带。

西城的东界，从子城与东城合二为一的情况来看，西城的东城墙即子城的西城墙。但根据《永乐大典》所附的广州府、南海县、番禺县图来看（因为图中的广州城尚未把北面的越秀山纳入城内，可知图中所绘的广州城墙应是以洪武十三年连三城为之前的广州地形图为蓝本绘成，间接反映了宋元时期广州三城的基本布局），西城东城墙要比子城的北面向北伸一段。此外，2000年在府前路北面，解放北路和连新路之间的恒鑫御园工地进行考古勘探和试掘得知：该区域在汉晋至唐时期尚为少人居住的山岗河汊。而到宋代以后，原有的河汊地已被填埋垫高，并在上面建有建筑遗迹，这一现象与宋代西城要比子城向北扩宽的情况是有密切关系的。

1996和1998年，在中山七路与人民北路交界处发掘出明代西城门的瓮城遗址，可推测西城的西界应在其东侧附近，这有待今后考古发现证实。2007年，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磐松楼南侧工地发掘出一段东西走向的宋至明代的城墙基址，可确定西城的西北界。至于其南界，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考古发掘报道，只能根据文献资料记载作一些推测。据曾昭璇先生研究，“南界即和玉带濠相当。……”这一推论应该是可信的。

（作者是南越王博物馆副研究员，研究馆员）

